

问题·理论·素养：英语专业研究型文学课堂的三维建构

——基于 V.S.奈保尔《布莱克·华兹华斯》的课堂教学实践

林 斌

厦门大学 福建厦门

【摘要】本研究基于为英语专业研究生开设的选修课程“现当代英语国家文学”二十年来的教学实践，以 V.S.奈保尔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特别是《布莱克·华兹华斯》这一篇目的教学思路为案例，回应新时期研究生教育中日益增长的学术能力培养需求。通过聚焦课堂教学策略及其有效性，本文探讨如何在外国文学课程中有效实施研究型教学法。研究围绕三个核心维度展开：文学阐释的问题导向、文本分析的理论视角，以及课堂内学术素养的培养，以期为新时期课程改革提供建设性见解。

【关键词】英语国家文学；研究型教学；奈保尔；《米格尔街》；《布莱克·华兹华斯》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专项课题、厦门大学研究生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资助

【收稿日期】2025 年 7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8 月 17 日

【DOI】10.12208/j.ije.20250310

Problem-Theory-Literacy through V.S. Naipaul's "B. Wordsworth": a tripartite model for research-based literary pedagogy

Bin Li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Abstract】 This study builds upon two decades of 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postgraduate elective cour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s of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for English majors. Taking the instructional approach to V.S. Naipaul’s short story collection *Miguel Street*, “B. Wordsworth” in particular, as a case study, it addresses the growing demand for cultivating academic competencies in 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Focusing on classroom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the paper explores how to implement research-oriented pedagogy effectively in foreign literature courses. The discussion centers on three key aspects: problem-based approaches to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textual analysis, and the in-class cultivation of scholarly literacy, offering insights into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Literatures of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V.S. Naipaul; *Miguel Street*; “B. Wordsworth”

1 引言

根据新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和要求，“研究生作为高素质专业人才，其学术能力的发展对繁荣社会科学，建设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就英语专业研究生而言，他们一方面推介自身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吸纳国外先进文化，有必要促进其语言发展、知识拓展和研究能力提升”（王雪梅 32）^[15]。所谓“学术能力”包括语言能力、知识能力、研究能力等三个层面，而

“内化了的学术能力”则被称为“学术感”；具体来说，“学术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形成学术感。所谓学术感主要指研究者对学术的敏锐感知和反应，是一种内化了的学术能力。……它是语言能力（外语和母语能力）、知识能力（知识建构和知识应用）和研究能力（一般研究能力和创新研究能力）的有机融合。具体表现在学术语言的应用，专业知识的建构、跨学科知识的拓展与应用，科研方法的掌握以及创新思维的培养

等方面”（35）。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语言能力所涉及的学术语言能力要与交际语言能力区分开来；知识能力所包括的专业知识建构与应用能力要体现在对专业知识的系统把握及其在理论、实践两个层面上的运用；研究能力所涵盖的创新研究能力指的是“有创见的思维，它运用新颖独创的方法来解决，产生新思想、新假设、新原理”，区别于运用已有理论、原理、原则、知识直接解决问题的习惯性思维。这些均属于英语专业本科培养阶段的薄弱环节，应在研究生阶段各类教学活动中予以着重强化，而研究型的课程教学模式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

具体到英语专业研究生教育，该阶段的课程教学明显有别于传统上以语言技能和知识点为核心的本科阶段专业教学，其特别之处在于，“有必要一方面注重理论知识的体系性，另一方面为研究生提供创新实践平台，促进其理论知识向实践的转化，激发其学术创新”（王雪梅 36）^[15]。为了真正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研究生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注重的是问题意识的培养，帮助学生养成文学阅读中的批判性思维习惯，以增进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这也正是学术潜力的开发过程。由于传统上“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过于注重知识传授，与科研需求结合不足，而在科研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取得的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因此在教学策略和方式上，研究生专业课教学可考虑采用“翻转式”的思辨教学模式，以学生为学习主体、以问题为导向来组织各个环节的教学活动，将知识传授与学术研讨自然融为一体，同时也需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将线下的课堂教学活动与线上的平台互动研讨充分结合起来。本文以“现当代英语国家文学”这门课所选取的奈保尔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Miguel Street*, 1959）的课堂教学实践为例，尤其聚焦于《布莱克·华兹华斯》（“B. Wordsworth”）这一篇目，分别探讨以课堂教学为依托的一个教学单元在课前、课上、课后这三个不同环节如何渐次展开以问题为导向、理论结合实践、与科研意识培养相结合的研究型教学。

2 作品解读的问题导向

首先，从课程设置上讲，“现当代英语国家文学”是一门已开设近二十年的研究生学科方向性选修课，课程内容设计上体现了后殖民时代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一些英美以外的英语国家的文学成就和文化诉求。考虑到英语专业学生在本科阶段对英美以外的英语国家文学

的关注度普遍不足，本课程在英语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中的地位在十余年间经历了一个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同时在课程思路上也体现了英语国家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一个动态发展历程，即：在选篇上始于边缘与中心的对抗与协商，随后引导学生渐次进入文学版图上相对陌生的领域，尝试从语境化的边缘视角来达到审视和解构国别文学版图上的层级政治之目的（林斌 158）^[10]。V.S.奈保尔（V.S. Naipaul, 1932-2018）之所以被选定为这个教学意图实现的一个初始载体，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当代英国文学的一名扛鼎作家，对修习过英国文学史及选读这类本科阶段学科方向性基础课的学生来说并不陌生，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作为“移民作家三杰”的特殊身份背景使得他审视帝国中心的边缘视角成为“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一个颇为恰当的切入点。

奈保尔是出生于拉丁美洲的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岛中部查瓜纳斯城（Chaguanas）的印裔英籍移民作家，也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于1959年发表了《米格尔街》，《布莱克·华兹华斯》正是出自于这部短篇小说集。整本书从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儿童视角出发，将背景设定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位于特立尼达岛的港口城市西班牙港（Port-of-Spain），聚焦于生活在米格尔街上的一群个性鲜明、性格迥异的社会底层小人物。这部小说集沿袭了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都柏林人》（*Dubliners*, 1914）、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 1876-1941）《小镇畸人》（*Winesburg, Ohio*, 1919）等作品所开创的叙事传统，只不过故事多了几分主观性，因为叙述者本人作为“同故事叙述者”（homodiegetic narrator）不仅是旁观者，也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这就使作品带上了强烈的自传色彩。

集子里的每篇故事就像是一幅人物素描，完全能够独立成篇，整体上虽然没有连贯的情节，但人物群像的塑造又有一种草根阶层的整体感，全方位地反映了作者自幼所熟悉的西印度群岛贫民窟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如《焰火师》一开篇交代，“要是陌生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时，只能说一句：‘贫民窟！’因为他也只能看到这些。可是，我们这些住在这里的人却把这条街看成是一个世界，这里所有的人都各有其独到之处，曼门疯，乔治傻，大脚是个暴徒，海特是个冒险家，波普是个哲学家……”（奈保尔 64）^[11]^①。从表面上看，这些卑微粗鲁、懒散古怪、游手好闲的各色小人物自暴自

^①原著中译本引文以下直接标注页码。

弃，一味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各有各的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偏执“追求”：自命为木匠的“哲学家”波普一心想要做一件“叫不出名堂”的东西（8），无业游民“疯子”曼门热衷于参加议员竞选（34），流浪汉“诗人”布莱克·华兹华斯梦想着写一首全世界最伟大的诗（48），以制造焰火为生的“艺术家”默尔根扬言英国国王、美国国王会花钱请他去给他们“制造任何人都没见过的、最美丽的焰火”（67），自称“注册会计师”的“教育家”霍伊特徒劳无功地向街上的野孩子们推行“洗脑教育”（76），“机械天才”比哈库百折不挠地拆装一辆辆进口汽车的零部件（124），“投机分子”理发师傅勒一门心思想要靠中大奖发财（143）……诸如此类，林林总总的这些困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无疑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者；虽说言谈中也不乏人性善的成分，但在他们身上几乎看不出多少改变人生轨迹的可能性。

事实也正是如此。米格尔街上的男人们大多沉湎于暴力、酗酒的不良生活方式，女人们则多半在家庭暴力下隐忍、劳碌，人命一如草芥般不值一钱，死亡常常在不经意间就轻易地发生了，在叙述中仅留下那么轻描淡写的一笔。用故事叙述的核心人物海特的话说，“这该死的生活真是活见鬼。明明知道要出麻烦事，可你他妈的什么事也干不了，没法阻止它。只能坐在那里看着、等着”（98）。以外强中干却不堪一击的暴徒“大脚”为代表，生存下来的那些“硬汉”们无论做出何种惊人之举，试图改变自身命运，似乎都无从逃脱命运的牢笼，比如：拿裁缝身份做幌子的博加特行为放荡不羁，三番五次地挑战社会规则，进监狱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出身贫贱却志存高远的伊莱亚斯想要靠考试来改变命运，怎奈屡战屡败，最终只好随遇而安，留在本地干起了开垃圾车的营生；曼门冒充救世主，上演了一出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受难的闹剧，然后就被当局监禁起来了；小丑般哗众取宠的默尔根在偷情败露后遭到悍妻当众羞辱，一气之下纵火烧掉了房子，终于“制造出世界上最壮丽的焰火”，却以纵火罪受到法律制裁；博勒的彩票终于中奖，但那竟是他人生彻底幻灭的一刻，他拒绝相信任何人，从此离群索居；而海特为了女人的背叛杀人未遂后入狱，等到这位曾经的“孩子王”出狱时“这帮孩子已经长大了”（181），他也便失去了他曾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威望。有评论家一针见血地

指出，“贯穿《米格尔街》的主题是特立尼达人难以有任何建树，因为这里的社会根本没有提供这种可能性”（方杰 59）^[9]。在小说结尾处，青少年叙述者就在即将滑入既定的这种成年生活轨迹之际，在母亲的鼓励和努力下，一举逃离了这一成不变的无望生活，只身前往英国求学深造。

作为奈保尔的早期作品，整部小说集以回忆的口吻记录下一些童年印象，集中反映出第三世界殖民地国家独立前夕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特立尼达是加勒比海最南端的岛屿，距委内瑞拉东北海岸仅 11 公里，面积 4768 平方公里，也是西印度群岛第五大城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全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现今是由两个主要岛屿构成的一个国家，其历史始于西班牙人在这些岛屿的定居。哥伦布在 1498 年的第三次航行中发现了这两个岛屿，此后多巴哥岛在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库尔兰人^②之间几度易手，最终落入英国人手中，而特立尼达岛在 1797 年之前一直在西班牙手中，后主要由法国殖民者定居。这两个岛屿于 1888 年合并成一个单一的英国皇家殖民地，1958 年获得自治并于 1962 年脱离大英帝国独立，1976 年成为共和国。独立后的特立尼达是长期以来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但它在短期内仍旧难以彻底摆脱殖民统治的深刻烙印。根据奈保尔本人在题为《两个世界》（“Two Worlds”）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的陈述，他出生、长大的地方特立尼达早期被开发成一块“新大陆种植园殖民地”，曾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来自印度的契约劳工；五年合约到期后，由于政策变化，“分得土地或者遣送回国的诺言并未兑现”，许多一贫如洗的人不得不“睡在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的大街上”。他由此感叹，“在我的孩提时代，我曾经亲眼见过他们。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穷困潦倒——这是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的——他们也并未给我留下印象。这正是种植园殖民地的残酷性之一”。如作家本人所说，他是一个直觉型的作家，其文学创作始终受直觉的驱动，实质上也是他不断拓展视野、由内向外了解世界的一个过程和一种方式：

“在孩提时代，我已经感觉到了两个世界：高大的瓦楞铁大门外面的世界，以及家里的世界——或者说，祖母家里的世界。这是种姓制度的一种残余，排斥并隔绝外面的一切。作为特立尼达的新移民，我们是弱势群

^②库尔兰公国（Courland）是曾经殖民美洲的最小的欧洲国家，只在 1654-1659 年及 1660-1689 年间在多巴哥有过殖民地。库尔兰位于现在的拉脱维亚，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块封地。

体，排外意识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它使我们能够暂时按我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按照我们自己的规则活在日益没落的印度——不过只能是暂时如此。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自我中心。我们搜寻自己的内心，过着自己的生活；外面的世界一团黑暗，我们对它毫不关心。”^[4,12]

而在“我成为一名作家以后，孩提时代围绕着我的那片黑暗成了我写作的主题：那片土地、那些土著、新大陆、殖民地、历史、印度、我觉得与自己有关的穆斯林世界、非洲、以及我在此写作的英格兰。这正是为什么我说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源于过去的作品、我是我所有作品的总和。这正是为什么我说，作为我写作的源泉和动力，我的背景既简单又复杂”。^[4,12]

其中，他特意强调的是，在写作生涯之初，“我的创作从街道上的芸芸众生开始。我希望我能一蹴而就，避免过多的自我拷问，因此我简化了一切。我简化了儿童讲述者的背景，忽略了街道上种族和社会复杂性。我什么都不解释，简单到底”。然而，作为奈保尔的早期重要代表作，《米格尔街》简洁朴素的语言风格掩盖不住主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在仲靖看来，米格尔街“贫困、闭塞、肮脏，毫无希望、令人窒息，然而华兹华斯等一群小人物却……用诗意的激情、痛彻骨髓的悲悯和对人肉体的热切关心在荒诞世界中生存，他们是现代人无奈而豪壮的隐喻”（75）^[17]。更如张德明所言，“那条街就是前殖民地的缩影。生活在那儿的人们，相对于上流社会，处在社会底层；相对于帝国主义宗主国，又处于文化边缘。他们是双重意义上的边缘人，具有比一般社会意义上的小人物更复杂的性格和命运”（67）^[16]。的确，从整体上看，这部短篇小说集生动地呈现出这个殖民地区的多元本土文化所受的致命冲击，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殖民地居民在丧失精神家园后的心理创伤，以及个体面临的自我身份认同困境。事实上，在全书的十七个篇目里，《布莱克·华兹华斯》之所以被当作重点导读对象，主要在于文学关联赋予这篇小说更为广阔的多维立体阐释空间。

3 文本分析的理论视角

如果说作品导读的语境化分析环节有助于问题的提出，那么如何解决问题才是依托文本的文学课程的授课重点所在，理论视角的介入则有助于提升文本分析的深度和有效性。以下分别从殖民语境、互文关联、成长主题等三个层面对《布莱克·华兹华斯》这一重点篇目的教学思路加以说明。

一是文本突显了加勒比地区的殖民语境。中译文标题将原文本的姓名首字母缩写“B.”直接转换成了

“布莱克”（Black），这个名字的字面意义虽是“黑人”，但其行为做派明显与这条街上的其他当地有色人种居民格格不入：他操着一口标准的英国腔，与儿童叙述者及其母亲的蹩脚英语形成了鲜明对照；他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厚着脸皮请求街上的居民允许他进到人家的院子里观察蜜蜂，还带着孩子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够写出一首“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篇”来（48）；他给孩子讲一个有关生离死别的凄美爱情故事，到头来却心灰意冷地矢口否认它的真实性。他效颦成拙，活出了一个失败的人生，贫病交加下抱憾而终。

如作家毕飞宇在《小说课》相关章节里的描述，在世俗眼光的审视下，布莱克这个人物在日常生活中一如鲁迅笔下的文人孔乙己，显得格外迂腐而荒诞^[6]。然而，殖民语境的确立在该人物的生活经历与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概念“模仿”（mimicry）之间建立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关联，这种关联或可将布莱克失败的文学事业归咎于殖民权力潜移默化的教化对当地文化产生的“去根性”影响。相反地，加勒比地区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 1930-2017）却成功地将西方文化影响与当地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以此来探索、反思加勒比海地区的历史、政治和风土人情，写就了像《奥米罗斯》（*Omeros*）这样的现代史诗；他曾被布罗茨基等誉为“加勒比地区最伟大的诗人”、“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人”，1992年因其作品“具有伟大的光彩、历史的视野，献身多元文化”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互文性观照下，虚构人物布莱克在他自己的诗句“往昔深邃而奇妙”之中看到了伟大诗篇的萌芽，并宣称“我希望能把一个月的体会感受全部倾注到这行诗句中去。这样二十二年以后，我就会写出一首震撼全人类的诗篇”，而现实生活中沃尔科特已将这诗句演绎出了华彩诗章。如将沃尔科特的短篇诗作《海葡萄》（“*Sea Grapes*”）等拿来对照解读，或可对布莱克这个虚构人物的失败根源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二是主人公布莱克·华兹华斯与英国19世纪著名浪漫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的姓氏重合不仅是一种由表面上的巧合制造的反讽效果，并且二者之间存在着互文关联，而这种互文性的深入发掘指向了殖民意识形态批判的主题。相比之下，同名所强调的并不是相似性，而是反衬出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一个是生活在19世纪英格兰的中产阶级白人，作为没落贵族的一员试图逃避工业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而寄情于山水，人称“湖畔诗

人”，主张“所有好诗都是平静中回忆的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因而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另一个则是生活在加勒比地区社会底层的有色人种个体，空有浪漫主义的诗魂和文学梦想，渴望从大自然当中汲取灵感，无奈却始终处于一种“失语”状态，根本无望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

霍米·巴巴曾在《文化的定位》一书中指出，“模仿是双重表达的标志；一种复杂的改革、监管和惩戒策略，当它对权力进行可视化想像时便会“挪用”他者。然而，模仿也是不恰当的标志，这种差异或抗拒凝聚了殖民权力的主导策略功能，加强了监视，并对‘正常化’的知识和惩戒权力构成了内在威胁”（Bhabha 86）^[1]。从这个意义上看，两位华兹华斯构成了一种互为镜像的自我/他者二元对立关系，布莱克对其原型的“模仿”失败暴露出了浪漫主义诗歌的语境依赖性：浪漫主义诗歌貌似标榜普适主义价值，其实代表的仍是某个社会阶层共同体的利益，将其剥离当时的语境、转而移植到殖民语境中是有很大风险的，布莱克的执着追求无异于自我抹杀和自我毁灭，最终等待他的结局是死亡和湮灭。这也充分暴露了殖民意识形态对当地文化的遏制与摧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莱克一直在刻意追寻那些毫无地方特色而言的蜜蜂、星星等自然意象，但自始至终却对自家院子里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芒果树、可可树还有李子树”视而不见，直到小说结尾处他与它们一起消失在工业化殖民力量的暴力碾压之下（51）。实际上，在他死后这些树“被人们砍倒了，留下的只是一片水泥砖铺成的地面”，“一切都好像表明 B·华兹华斯从来没有到过这个世界”（51）。也就是说，尽管小说中交代布莱克的职业身份是西印小调卡利普索歌手（calypsonian），但由于他毕生的艺术追求有失偏颇，他对本土文化的贡献可谓微乎其微。借用方杰对奈保尔作为一个特立尼达人的早期创作困境的描述，“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自己文学传统的殖民地，没有可资模仿的文学资源，找不到可以将自己熟悉的生活转化为文学的既有模式，而他所读到的文学，表现的则是他并不十分了解的西方的生活经验，也无法为他提供太多借鉴。这就是说，在他的生活经验与文学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60）^[2]。这也正是布莱克这位街头“诗人”失语的根源所在。

三是第一人称同故事叙述者的儿童身份构成了文学中的后殖民成长主题的一个切入点。纵观全书，布莱克与海特一样算得上是“我”的两位成长导师。从海特的人生态度及其对身边人物的实时点评来看，他代

表了生活中现实的一面：“我一直把海特视为安于现状的人，除了以往他所干的事情之外，很难想像他还会去追求其他的事”（176）；“他似乎什么都不需要，非常自足”，但唯一一次“出格”的爱情经历却使他身陷囹圄，出狱后“我”发现“他身上失去了一些原有的光彩，与他交谈也感到有些乏味”（181-182）。在他缺席的三年间，海特已失去了精神导师的身份，“我”则彻底摆脱了对他的精神依赖，成长为一个独立个体。如《海特》结尾处所述，“海特进监狱时，我的一部分也随之死掉了”（182）。这就是说：至此他已跳出了海特视角的局限，获得了独立的价值判断标准——“很久了，也不过只有三年。在这三年中，我长大了，学会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人。我不再希望成为埃多斯那样的人了。他太瘦弱了，而且还那么爱笑。泰特斯·霍伊特是那么愚蠢和乏味，没劲透了。一切都变了”（182）。然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虽与布莱克的接触时间相对短暂，但这位“诗人”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因为他代表了超越庸常现实的理想一面。“我”在他的引导下获得了崭新的视角，在日复一日单调重复的生活细节中发现了浪漫诗意，不无兴奋地惊叹：“这世界真是个令人振奋的地方！”（47）虽说布莱克最终被无情的现实彻底击败、摧毁，他临终前的幻灭对年少的“我”也不失为一个沉重打击，但他在少年心里播下的理想的种子却在悄然生根发芽，化作少年构筑起自身心之所向的精神家园的根基；这样一来，“我”有朝一日逃离殖民地、奔向宗主国理想之境的结局也就成为了偶然中的必然。

简言之，这个故事关乎一个尚且不谙世事的纯真男孩和一个穷困潦倒的流浪诗人之间的一场纯真友谊及其悲剧收场，但它立意深远，其内涵值得深度挖掘，教学的关键就在于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渐次找到开启文本多重深意的线索，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理论在文本分析实践中所起的作用仅是为解决问题助力而已，谨防将文本变成了证明该理论的适用性的又一个文学案例。可以说，如何将理论视角巧妙嵌入文本解读之中，这正是研究型教学法的关键问题。

4 学术素养的课堂养成

研究型教学的终极目的是科研能力的培养和学术成果的产出，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注重如何以成果为导向来引导学生有效提高学术素养。接下来将以奈保尔这一单元的一系列教学任务创设及其要点分析为线索，围绕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的成果产出路径展开具体讨论。

其一，课前思考题设计。对于文学文本教学，课前预习环节成败与否的衡量标准在于对文本要素有点面结合的把握。所谓“面”是指对文本内容的整体理解，涵盖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主题表现、叙事手法等方面；所谓“点”是指有所侧重的重点聚焦，要求学生能够调动起先前积累的阅读经验来敏锐地发现文本的特殊性和深度理解文本的切入点。虽说“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对于后者有着总体上的积极指导作用，有助于学生将阅读过程中的零散发现和感悟汇总串联起来并初步形成一些观点，但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任课教师可通过布置思考题的手段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聚焦于某些方面，从而达成课程的预期教学效果。以《布莱克·华兹华斯》为例，课前思考题主要围绕主人公布莱克及其与第一人称儿童叙述者“我”的互动关系展开，分以下三个层次启发思考。1) 从读后对布莱克的初步印象入手，先粗略分析得来印象的依据；2) 然后再深入探究布莱克对“我”造成的影响，其中特别强调的是布莱克临终前矢口否认他先前讲述的凄美爱情故事真实性这一细节在“我”心中留下的困惑，同时也要顾及小说描述的米格尔街背景（包括地理空间特征、社会环境、社群共同体等），以突出这种影响在少年成长中所扮演的塑造角色及其对少年日后逃离这一环境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3) 接下来着眼于布莱克的“诗人”身份，从他的诗志、诗魂、诗论三方面出发，结合作家本人的思考，探索其“壮志未酬身先死”的社会原因，为进一步揭开小说的后殖民批评主题打下伏笔、做好铺垫。

其二，课堂讨论引导。就研究生阶段的文学教学而言，这个环节最为重要的是理论介入。学生在课前预习中应已充分理解文本内容，并且在思考题的引导下由浅入深地展开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同时也针对难点和重点提出了一些问题。任课教师在有限的课堂时间之内需要做的不是简单重复那些浅表层次的理解，而是围绕学生提出的问题，帮助他们有效地突破难点，借助于理论来分析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生成自己的观点。如前所述，这门课程贯穿的理论视角是后殖民批评，同时也可以辅之以其他与文本贴合的理论，理论的应用旨在解决由文本细读派生出来的问题，达到以点带面的阐释效果，绝非为理论提供又一个文本范例。在后殖民视角观照下，《布莱克·华兹华斯》的殖民语境对本土作家的影响问题浮出水面，这也是奈保尔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由于《米格尔街》这部小说集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诗人在加勒比地区的身份和角色

也可看作小说家基于自身经历的一种深刻反思。如奈保尔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早期喜剧颇有点神经质，源于对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的位置和在这世上的位置的焦虑”（Naipaul 106）^[5]。相应地，小说中的两行对话一语双关地传递出这种神经质般的焦虑：当“我”和布莱克一起躺在草地上看星星时，一个警察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问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布莱克当即答道：“已经四十年啦，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呢。”

（46）追根溯源，奈保尔的焦虑多半来自于他的边缘身份——他“始终面临两个世界的双重困境，对于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认同。因此，他游离于两个世界之间，在边缘写作”（孙妮 44）^[13]；“作为双重移民，他受到了地理空间转移带来的文化穿越的冲击，各种文化的撞击、融合成就了奈保尔。在经历多种文化疏离后，他产生了文化身份焦虑，但他又自觉开启了自我追寻的文化身份苦旅”（邓玉荣 95）^[8]。

那么，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是：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如何以文学形式再现这种焦虑？它承载着奈保尔对第三世界作家之社会角色的怎样一种思考？同为加勒比地区重要作家的乔治·拉明（George Lamming, 1927-2022）曾将奈保尔的作品称作“被阉割的讽刺”（castrated satire），指责奈保尔对他笔下的第三世界文化心存偏见，他的作品存在着曲意迎合西方读者品味之嫌疑^[3]，那么从《布莱克·华兹华斯》这一特定文本出发应该如何评判针对奈保尔在殖民语境下开展写作的这种负面评价呢？此外，在后殖民视角下回过头去重新审视布莱克这个人物，或许能够加深对“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及其适用性的理解。正如王宁所称，20世纪以来学界已几度刷新对“文学经典”（canon）的界定标准，并且深刻认识到“在撰史的背后起到主宰作用的是一种强势话语的霸权和权力的运作机制”（107）^[4]。罗伯特·伊戈尔斯通指出，文学经典“文化正典对塑造共同文化记忆与国族认同具有关键意义”（Eaglestone 57）^[2]。这样看来，“新批评”所标榜的文学“普世性”（universality）其实并不存在，每一种哲学思潮及其所派生的文学运动都有其发生和发展的特定历史语境，脱离语境的盲目效仿势必会使文学创作实践与布莱克毕生追求的以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为准的所谓“伟大”（greatness）背道而驰。

其三，课后单元小结。通过上述理论介入的文本分析，学生在任课教师的引导下初步完成了观点生成的任务，遂可在此基础上谋求创新。实现这个环节的教学目的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学术写作方式，写作使授课过

程中获取的知识点和技能得以巩固，避免只留下一些支离破碎的印象。任课教师可以结合本单元的教學目的布置命题论文，也可以让学生自选题目，后者可能会收获更为多样化的发现。命题论文的优势就在于，一方面可以集中、有效地检验课堂教学的效果，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布置延伸阅读书目方式推动学生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纵向加深对特定文本和相关理论概念的理解。具体到《布莱克·华兹华斯》这个短篇，由于课前思考题和课堂导读都聚焦于布莱克由于盲目模仿而失败的文学事业，因此课后写作任务可以从霍米·巴巴的“模仿”概念入手，以布莱克的经历为例探讨被殖民的主体如何应对殖民教育和异国文化强加于他的英语文学经典这个问题，再结合奈保尔本人的写作理念揭示殖民权力对本土文学传统的破坏力，以及殖民语境下文学经典形成的政治干预，等等。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一门课程的完整设计，教学效果考查与期末论文撰写这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各单元的写作任务以外，首先是课堂测验：任课教师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出题，简单测试一下学生对研究对象文本的基本要素的把握程度，但需注意的是有关情节、人物等要素的问题涉及到的文本内容不宜过细，应以主题相关度为准，重在引导，使之从一开始就与接下来的教学重点有连贯性，这一点对于长篇小说导读来说尤为重要。再者，作为最重要的考查方式，期末论文的撰写要做到全程监控，特别是开题环节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一来是为了确保产出质量，二来也是为了规避学生对 AI 工具的滥用。为达到预期效果，任课教师在开课之初便可将课程阅读书目分配给每个学生，随后在按计划开展教学的进程中按部就班地展开流程管理，监督学生依次完成论文选题、提纲设计、文献综述、论文初稿撰写等各阶段的写作任务，直至提交论文定稿作为期末成绩评定的主要依据。此外，在保质保量完成英文论文之余，还应鼓励并指导有余力的学生将其改写成中英文期刊论文，尝试以此参加学术会议或向刊物投稿，由此迈出学术研究道路上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5 结语

常俊跃、于欣慧在谈到研究生课程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时说，“英语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覆盖面广，内容非常丰富，基础课程比较多，各个方向都有涉及，但是很多课程探讨的深度仍然不够”，故“任课教师有必要深入了解研究生的整体课程设置、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学生的需求，有的放矢地组织教学，帮助学生掌握完整的知识体系（43）^[7]。与此同时，“研究生课程

设置中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失衡的现象较为突出，专业理论教学偏多，不利于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对学生未来帮助不大”（43）。因此，在明确课程教学目标与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现当代英语国家文学”这门课的课程教学策略是本文重点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如何在课堂实践中将理论视角与文本解读有效地结合更是一个难点和关键点，这直接关系到研究生科研潜力的开发和学术能力的发展。本文针对奈保尔小说导读的教学案例展开的分析全方位展示了问题意识激发、理论视角代入、成果产出路径在英语文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对学术素养培育的目标达成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或可为研究型教学的理论构建和课堂实践提供些许抛砖引玉的思路线索。

参考文献

- [1]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2] Eaglestone, Robert. *Doing English: A Guide for Literature Students*. 3rd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3] Lamming, George. *The Pleasures of Exile*.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
- [4] Naipaul, V. S. “Two Worlds” [Nobel lecture]. NobelPrize.org.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01/naipaul/lecture/>. Dec. 7, 2001.
- [5] Naipaul, V.S. *Writing Across Worlds: Contemporary Writers Talk*. Ed. S. Nast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6] 毕飞宇：《冰与火——我读〈布莱克·沃兹沃斯〉》，《小说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67-87页。
- [7] 常俊跃、于欣慧：《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研究生课程问题研究》，《当代外语研究》，2015年第11期，第40-43页。
- [8] 邓玉荣：《流散写作与身份追寻——奈保尔的文化身份解读》，《国外文学》，2021年第1期，第88-95页。
- [9] 方杰：《“社会喜剧”中的焦虑与渴望——论奈保尔早期的小说创作》，《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第58-66页。
- [10] 林斌：《高校英语专业文学课程的疆域拓展与边界跨越——探索从英美文学到英语文学的教学改革思路》，《高等教育教学实践探索——厦门大学解决方案》，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58-166页。
- [11] 奈保尔：《米格尔街》，王志勇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

- 社,2003年.
- [12] 奈保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获奖演说:两个世界》,成云译,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3/1116/15/49165069_1104246242.shtml.2003年11月16日.
- [13] 孙妮:《两个世界 后殖民作家的双重困境——以 V.S.奈保尔为个案》,《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44-55页.
- [14] 王宁:《重划文学研究的疆界》,《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1期,第103-109页.
- [15] 王雪梅:《对英语专业研究生学术能力内涵及其发展过程的再思考》,《当代外语研究》,2013年第2期,第32-36页.
- [16] 张德明:《<米格尔大街>的后现代、后殖民解读》,《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66-71页.
- [17] 仲靖:《奈保尔<B·华兹华斯>的存在主义解读》,《文学教育》,2023年第7期,第73-75页.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